·九一八事变前后·

日本间谍中村大尉事件的真相

李 富 源*

杜建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原国民党天津市市长、北宁路护路中将司令）审稿意见：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传播日本中村大尉失踪的消息，当时人们猜测是日本为进攻东北制造借口，未必真有其事。作者所述可能是事实。可编目保存，为整理九一八事件的参考。

1931 年，日军参谋部派大尉部员中村震太郎化装冒充农业专家，潜赴东北大兴安岭禁止游览地区绘制军事地图和拍摄有关军事地形地物的各种照片，被当地驻军东北兴安区屯垦公署第三团抓获。间谍证据确凿，满怀民族义愤的官兵于盛怒之下，将中村等处死。骨灰倾入洮儿河顺水漂散。事后日军企图以中村事件作为发动武装侵略我东北的借口，但未能得逞。以后，日本关东军又在沈阳附近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自从 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受了蒋介石的诱惑通电拥蒋，率东北军近十万人开进山海关，救了蒋。可东北防务大大空虚，蒋在中原大战平息后，坚持继续反共，集中数十万大军向工农红军根据地“围剿”。蒋介石把全部精力放在打内战和内部斗争上，根本不顾外患。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这是武力征服中国东北，实现满蒙“国策”的大好时机。于是，就派中村震太郎潜赴满蒙进行间谍活动，为武装侵略我东北提供可靠情报。

1931 年 7 月某日清晨，驻在内蒙王爷庙的兴安区屯垦公署第三团团长关瑞玑（玉衡）率部队巡视防区边防，留第一营营长陆鸿钧代理团务。就在关团长出巡走后两个多小时，卫兵发现团部附近有牵着马匹的四个人在拍照测图，认为行踪可疑，遂报经值星官，将可疑人带到团部，见是两个日本人，一个白俄人，一个蒙古人。索验中国发的证件也没有，遂将他们扣留。由团附董平兴（曾留学日本）做翻译讯问被扣的日本人，只说是考察农业，名中村震太郎，农业专家；另一日本人名井杉延太郎，是中村的助手；白俄人是临时雇工专管饲养马匹及杂务；蒙古人是雇的向导，不承认有间谍行为。

到天黑关团长巡边回团后，经关团长亲自提讯，中村仍然坚不承认。但查阅他们携带有测绘仪器和照相机，其所测绘的地图非常详细，如道路宽窄，桥的负荷量，河面

* 作者当时系白城子东北兴安区屯垦公署财务处中尉科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宽、水深等，都是符合军事需要的。正好团里有位连长（名忘记）幼年曾在苏联住过十几年，精通俄语，就叫他任翻译，提讯白俄人。据供他是临时雇用的，专管饲喂马匹代做饭。还供日本人中村震太郎是个大尉，井杉延太郎是日本军曹，给中村当警卫的。他们住在距离王爷庙约 50 华里的扎赉旗王爷府里，蒙古向导是王爷派的。他们每天白到各处测绘和照相，遇到河流，连水深水宽都要测量，不管别的事。当时认为中村隐瞒军职，冒充农业专家，又无中国政府发的证明印证，他们行动和测绘的证据，肯定是个军事间谍无疑，究竟怎么处理，关团长提出征求大伙的意见。

每个连推选两名代表参加开会决定。会上官兵一致认为，这批间谍如果解送沈阳边防长官部处理，日本人知道后打个电话就得无条件释放。可间谍所得到的军事材料都被日军掌握，一旦他们发动侵略，我们就防不胜防。事关民族兴亡，决不准把国家边防机密泄露给日本人。究竟怎么办呢？大家注视着关团长。经过稍加思考，关团长用手在桌上写了一个“死”字，大家一致表决同意。关团长宣布即刻执行，到会人员一律宣誓，对这件事绝对永远保守机密。当夜将中村等四人连同马匹一律处死，火化成灰，把骨灰倾入洮儿河，顺水漂散。

事后，沈阳长官部几次来电询问此事，都没有承认。到 8 月上旬，东北宪兵司令陈兴要亲自乘铁路专车到白城子屯垦公署调查，才承认此案。为了不使事件扩大，陈兴要与屯垦公署总办高仁绂（督办邹作华出国考察不在国内）商议委曲求全，将关瑞玑团长撤职，随陈解往沈阳，计划经过外交途径解决。还没有听到对关瑞玑处理结果，日本关东军就另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向沈阳大举进攻了。

对关瑞玑团长的撤职解沈处理，全屯垦军人员都认为弱国无公理，竟将这样的为国忠贞的好团长撤了职，还解去沈阳，哀求日本侵略者处理，实在叫人万分气愤！

（1984 年 1 月）

九一八事变后张海鹏投降日寇的经过

赵 万 福*

原东北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出身绿林，性情粗暴，刚愎自恃。九一八事变后，我在他的部下当医务处长，也与他一起投降了日寇。谨将当时经过的一切实况，回忆叙述如下：

当事变发生之初，张海鹏曾打算将他原有的四个骑兵团，化整为零，在洮昂铁路沿线，抗拒日寇的北犯。但他只为个人利益打算，而无抗敌决心。正在举棋未定之时，忽接到东北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代电和张学良由北平的来电，均示以避免冲突，放弃抵抗。于是张海鹏乘机以民意为名，自封为蒙边督办，把原镇守使署改为蒙边督办公署。

张海鹏与驻洮南满铁公所（实际就是日本领事馆）所长河野正直，平素往来很好。九一八事变后，接到河野的通知说：关东军一个小队将要来洮南视察访问，决无敌对行为，访问后当日即返回沈阳，请勿疑惧等语。 9月 20 日，关东军的那个小队到洮南之前，张海鹏派参谋长李盛唐负责招待并迎送。而张海鹏恐怕发生意外，亲带着卫队 20 多名，分乘汽车到洮南以北约 80 华里的瓦房镇，以保临时的安全，待日军去后，即回洮南。

9月 26 日，关东军派来参谋吉村、大矢等四人潜来洮南，通过河野正直所长的介绍，以金票 26 万元、大盖枪万余支、皮棉被服万余套为条件，向张海鹏进行招降。张是一个爱金钱慕权势之徒，所以接受了投降的条件。

张投降之后，日寇于 10 月 4 日就将枪支、被服送到洮南。10月 6 日，关东军又派来以前的四个参谋带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示，命张海鹏整军赴黑龙江去当伪江省的督军（原黑龙江省督军万福麟早随张学良去北京）。这四个日军参谋住在洮南满铁公所，在河野正直所长的斡旋下，随时同张海鹏进行协商进军黑龙江省事宜。 10 月 7 日，张海鹏派他的长子张俊哲去黑龙江省同万国宾（即万福麟之子）进行协商，以来江共同抗日为名，得到万国宾的同意。万遣江省边防军参谋长王静修送来小米 1000 石，作为张海鹏进军江省的行军费，以表示欢迎；同时又有江省地方士绅广铁生等五六人，自称代表江省民意，来洮南欢请张海鹏去江省。

以上这些代表及关东军参谋等都云集于张海鹏公馆，日夜分别同张海鹏个人密谈。司令部里如我们这些部属是不得参与其事，只得整日在公馆守候，打听密谈的消息。惟恐一旦出兵江省，势必成为全国众矢之的，或因此而发生军事冲突，给日寇北犯江省创

* 作者当时系伪军张海鹏部医务处长。

造了机会。因为当时江省方面，除了万国宾个人与张海鹏有私人友好关系，同意张海鹏去江省外，其他江省的许多实力派，反对张海鹏者居多。如驻白城子的屯垦军（系原邹作华的东北炮兵改编），是和张海鹏矛盾最深的，听到张海鹏投降日寇，又有整军人江的消息后，撤离原白城子的防地，将全部军队迅速开赴江省（约一个旅以上的兵力），这是抗拒张海鹏去江省的明显事实。即使士绅代表等也是脚登两只船，各为己利而已。张海鹏利令智昏，主观认为既有关东军的支持，又有江省代表的欢迎，伪督军的席位不成问题了。

10 月 12 日早晨，我们得悉张海鹏接受关东军的指示和所谓江省代表的请求，决定 10月 15 日进兵黑龙江省。当时伪司令部各处长及各团长等，按参谋长的指示，在张海鹏的公馆直守候到晚十点。在各代表方离去公馆的时候，我们这些处长及各团长等，在参谋长率领下，公推徐景隆团长（系张海鹏的患难老友）为晋见代表的发言人，直陈进军江省的不利，这样做势必受到全国人民的痛恨及舆论的谴责。话未落音，即遭到张海鹏的拍案痛骂，他说他得罪不起关东军，就得去江省，话后忿忿离席而去，拒绝了大家的意见。当时我们都感到非常窘迫，尤其是代表发言的徐景隆团长更感懊丧不已。后由鹏飞团长出头，找到张海鹏屈膝叩头，重新被拒绝之后，就没有人再敢进言了。张仍按照他个人的意图，令参谋处长发令如下：（1）命徐景隆团长率所部一个骑兵团为先遣部队（因该团驻在白城子距离江桥较近），于明早起日夜兼程前进， 14 日到达江桥保护江桥。（2）命鹏飞团长率所部一个骑兵团直赴江桥作徐团长的后应。 （3）命付靖芬率所部一个骑兵团留守洮南。（4） 司令部在 10月 15 日早晨 7. 点由洮昂铁路乘车，卫队连随行，向江桥进发。（5）命刘茂义率所部一个骑兵团随司令部列车之后，负后卫的责任。

这个命令下达后，激起各方面的愤慨和不满，举例说明如下： （1）10 月 15 日早晨，司令部出发时，所有洮南地方士绅到站送行者寥寥无几。 （2）洮昂铁路局、洮南车站的负责人，并没有及时按照预先的指示准备好车辆，而且当时车站上并没有几个人，找不到挂车的负责者，已是工人罢工的现象，路局负责人临时几次派人到各处去找，后来才找到二三个人，大都在不满的情绪下，调配车辆，以致延误了预定开车的时间约两个小时以上，到九点多钟才开车。（3） 司令部的列车由洮南向江省进发，到达距离江桥约 200 华里的镇东县车站时，突然见到先遣部队徐景隆团长登上了司令部的列车，当被参谋处长哈玉良斥责其有失保护江桥之责。徐景隆团长未发一言遂下车而去，列车在两小时后，前进到距离江桥约 20 华里的地点，见到江桥起了大火，浓烟冲天，据附近人说，起火的时间不过在一个小时以前。 （4） 先遣部队既未完成保护江桥的任务，致使江桥烧毁，不能通过，不得已司令部回到泰来县驻守。为了防御江省军队的袭击，临时命令后应部队鹏飞率队直达江桥南岸驻守。鹏飞率队到达江桥后，只驻守四个日夜。在不满的情绪下，于 10月 19 日自动撤离江桥南岸阵地，直回洮南原防地。在江桥南岸阵地空虚的时间中，江省军过江给埋了一些地雷。 10月 21 日早晨,行营司令部又派徐景隆率骑兵一个团来到江桥。徐景隆在巡视江桥南岸阵地时，触雷身死。（5）司令部驻泰来之后，张海鹏经常往返洮南泰来之间，因此将泰来行营司令部的一切事务交由参谋处长哈玉良代行职权，而哈由于不满张出兵江省，于 10月 25 日弃职携

款潜逃。

张部由江桥烧毁退驻泰来之后，关东军于 10 月 17 日又派来参谋两人到泰来县行营，同张协商驱使骑兵乘马冲塞渡江（当时 10 月下旬松花江已在半结冰的状态）。张当时想到在这个冰寒季节中，乘马渡江是关东军两个参谋给他的一个大难题，尤其是江桥烧毁，他的江省督军席位，已经绝望。他就大发雷霆，拒绝了渡江。前来的两名参谋，看情势不妙，怏怏地走了。以后张经过考虑，他认为临时暴躁得罪了关东军，今后势必遭到关东军的不满，将来难逃被缴械或被消灭的命运。因此，张又在 10 月 19 日派参谋长李盛唐和长子张俊哲，前往关东军司令部道歉并保证今后一切合作。

有关江桥被烧毁事件的发生，据听说是由于万国宾同伊父万福麟发生矛盾的关系。原来张伪派长子张俊哲去江省同万国宾协商时，万国宾虽同意张早到江省共同抗日，但万福麟对张极力反对，因此万福麟由北平直接电令马占山（当时任黑河镇守使）到齐齐哈尔主持军政，才发生了江桥被烧毁的事。

10 月 20 日，张伪为了扩军，命令所属骑兵四个团，均改为支队，各团长均升为支队长，每一个支队等于一个骑兵旅。各支队可随便到各处招募土匪，有枪有马即可招收，凡招足一个连的即委为连长，足一个团的委为团长，共编成四个支队。另外将九一八事变前，在洮南为张学良修建营房的建筑工人，也改编为一个步兵团（在接受投降日寇条件时就已编成）。

所谓江桥战役的开始是在 10 月 26 日，首先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给张海鹏和江省军的命令各一份，内容是借口洮昂铁路是由日本借款修筑的，关东军有保护和修复的责任。在修复江桥的时候，在江桥南北两岸的军队必须撤离江桥若干公里之外。当关东军这个命令发出之后，张的军队即由江桥南岸撤回泰来县，随后日寇的工兵约有一个营左右前往修桥，被江桥北岸的江省军给打退回来，并且发生很大的伤亡（详细不明）。随后，日寇又调来大约一个师团左右，由泰来县车站陆续乘车北上。从此，日寇和江省军队正式开始了江桥战役。也可以说自从九一八事变日寇侵略东北以来，日寇横行东北奉吉两省，从没有遭受过这样的抵抗，江桥战役可算为东北的第一次抗战了。我们在泰来县每天不分昼夜听到炮声。我在无事的时候，经常到泰来车站，多次见到日寇伤亡列车由江桥路过泰来向南开去，约四五天以后炮声听不见了，那就是日寇已过江北犯了。 11 月上旬，奉张伪命令，将驻泰来的行营全部撤回洮南。

1932 年春，关东军派步兵一个大队来到洮南驻守，队长前田右卫门步兵大尉与张逆往来频繁，并且时常举行宴会。在饮酒助兴之中不断地互祝“日满亲善，共存共荣，一德一心，欢迎王道乐土的来临”等口号。

1932 年 3 月，奉伪满洲国政府的命令（即关东军命令），将原蒙边督办公署改为伪洮辽警备司令部。关东军派来步兵大尉一名（忘其姓名），作为伪司令部的顾问，同时带来几名日本浪人充作伪满洲国人，穿上伪满军装，与伪满军一同行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九一八事变后关内外一度通车的经过

张　鹏*

我是学铁路工程的，1914 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铁路工程专科（当时叫做铁道部铁道讲习所铁路工程专科），毕业后就被铁道部派到东北吉长铁路工作。九一八事变前，我在东北的吉长、吉敦等路线上工作达十四五年之久，仅在吉长线就约八年的时间，后来由吉长线调到北宁路工作。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时，我在北宁路关外沟帮子段任管段工程师（即工务段长），因此，当时关内外铁路上熟人很多，不是老同学，就是旧同事，旧社会里，像这种情况做事是较为方便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日寇一夜之间占领沈阳，继而很快地占领长春、吉林、郑家屯、营口等城市和港口。对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坐视东北大好山河，让日寇不费一枪一弹，轻易地占去，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非常气愤。

日寇占领上述地方后，不久就轰炸沟帮子车站（该站在锦州西，炸过后我即修复），开始沿北宁铁路线西进，企图入侵关内。当时中国的铁甲车司令驻在沟帮子，我们铁路员工奉铁甲车司令的指示，同时西撤。一直退到山海关时，接到天津方面北宁铁路局的指示，让我们在山海关候令。这时，日军侵犯暂止于绥中（距山海关约两三站地）。铁路方面的关外段（沈阳一绥中），另成立了一个奉山铁路局（奉山即沈阳至山海关），日寇派阚铎为局长（阚铎曾任过吉长路局局长，和我是老同事。我在山海关时并不知道他是局长，北宁路局是知道的）。

恰在这时候，外交团①向中日双方提出恢复关内外通车的要求，理由是北宁路是“国际”路线，不能因中日纠纷影响通车，应迅速恢复关内外客货车通车的运行。这时北宁铁路局来电报让我回津有事面商。我接到电报后，就随车赴津，先到工务处见处长（处长华南圭是我交大的老师），处长将外交团要求关内外通车问题给我说了一遍，让我为这事到沈阳去一趟。我当即表示不肯去，回答说：“这是外交问题，工程技术人员不会办外交。”处长又说：“因为你是两方面的熟人（指北宁铁路局和奉山路局），高局长（北宁路局局长高纪毅）愿意让你去，那方面的阚局长原为吉长路局局长，是从吉长来的，你在吉长路作事多年和他是认识的；这方面（指北宁路局），高局长是你的老同学，就你说双方都是熟人，人熟是一宝，办事方便。现在在外交团的要求下，铁道部让我们路局负责办理这件事，所以考虑让你去较合适。”听了后，我认为人都是熟人，又不是办正式外交问题，只是代表路局进行接洽，洽商通车技术问题。于是就答应了。

* 作者当时系北宁路关外沟帮子段任管段工程师（工务段长），后任唐山段管段工程师。

① 外交团是当时的美英法等驻华使节组成，其领导人由英美法等使节轮流担任。

处长接着又说：“你认为可以去，就去见见高局长吧，跟局长谈谈。”

我去见高局长，他说：“你来得很好，这回要老兄给我办点事，就是外交团要求关内外通车，铁道部责成我们路局想法解决。我想了半天，到关外与对方（指伪奉山路局）联系，只有你较合适。我们这里就不用说了。你在吉长线作事多年，跟阚铎是老同事，还有工务处长（赵心哲）及许多处长，他们都是从吉长线或四满线来的，你也都认识的，所以我想还是你去走一趟较合适。”他又说：“这次接洽我方任务有二：一是洽商关内外通车事项；二是商议凡从关外退到关内的员工都送返关外问题。这也有两点用意：其一是为将来收复关外铁路方便；其二是现在铁路线缩短了，退到关内的员工今天要工作，明天要饭吃，这么短的路线，如何能安排这些人呢？把他们送到关外，以后可减少许多麻烦。”

我听了高局长的一席话，就答应他为了同学关系可以走一趟。他见我答应了，很高兴地说：“你愿带谁去就带谁去，要多少费用就给你多少。”我回答说：“要不了多少钱，两人 100 元（光洋）足够了；人嘛，李则曾（帮工程师）不是愿意去吗？就让他跟我去吧。”高局长说：“那么你怎么走法呢？”我说：“由塘沽坐船到大连，再由大连乘车赴沈阳。”我们两人研究好了，第二天（日期记不清了），我们就由天津动身赴塘沽，由塘沽很平安地经大连到达了沈阳。

到了沈阳，一出车站就遇上了许多吉长路上的旧相识，他们请我们住某某旅馆，说：“那里都是我们吉长路上的旧人，住在一块方便。”于是我们就住在这个旅馆。当日晚间出旅馆时，有一日本稽查人员（特务）以手枪指向我：“你是什么人？哪里来的？”我立即拿出北宁路长期乘车证（当时我们路上员工都有这种乘车证）给他看，他一见就连忙说：“要希（很好），你的随便吧！”

翌日，我先到奉山路局去见阚局长。即见阚局长，他以为我是为了个人的工作来的，说：“你来得很好，我们老熟人，你愿意在局里就在局里，愿意在外段就在外段；局里外段都行。”我对他说：“我这次来不是为我个人的事情，是受天津方面路局委托来的，有两件事情要跟局长商量：一是应外交团的要求，天津的高局长派我来洽商关内外通车问题；再一个是商议关外段退到关内的员工返还关外问题。”他听了说：“好！这方面也是经外交团要求，奉到指示要办关内外通车。为此，我们专门组织了一个洽商关内外通车委员会，派赵处长（工务处长，名叫赵心哲，系日本工科大学毕业，其妻为日本人，此人办事亲日表现很严重）为委员长，你是认识的，你就参加这个委员会，跟他们一同到山海关商办好了。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完全答应，因为多一个中国人，将来恢复就多一个方便。下一步的实际工作，你去跟赵处长谈谈吧，你们俩也是熟人，可以具体地谈谈实际工作怎样进行。”

从阚铎处出来就到工务处，一见到赵心哲他也和阚铎一样，以为我是为了个人工作问题来的，我立即对他说：“非也，我不是为个人的事来的，另有使命。”然后就把前意向他说明。他听了说：“很好，这里组织了个通车委员会，一两天专车赴山海关。我们一块去好了，关于工务处员工退返关外问题，我完全答应，其它方面的员工退返问题，局长既答应了我想是没有什么问题。”他接着说：“但是 60 岁以上的人就不用让他们回来了(因为年老不能工作了)。”

过了两天，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洽商委员会专车前赴山海关。到达后，就在山海关车站一个很大的旅馆住下。吃晚饭后，赵心哲就召集各随员研究与北宁路接头事宜——如何进行分别接头，研究通车技术问题。他首先发表意见说：“我的意思是明天我们接头时，先把山海关站接收下来，一切人员设备由我们分配，可否，请诸位发表意见。”这时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于是我站起来说：“不行，我们此来的目的是为了洽办关内外通车事宜，通了车，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按你的说法，先接收车站，然后分配人员，问题就大了。若为此，将使战事再起（当时日军暂止于绥中暂无战事），和洽办通车目的不符合，应该仔细研究才好。”他反问：“你的意思如何？”我说：“日军才到绥中，并未占领山海关，为何要接收山海关车站重新分配呢？我们是办通车问题来了，不是办接收来了。再说跟我们接头的人无非是车、工、机、电、检等几个段长，他们无权将车站事宜交给我们。为了通车，方便洽商起见，莫如山海关站还由原山海关站人员掌握，叫他们给我们腾出一处办公房屋及住所，我们双方有关人员在这里分别接头，商议通车有关问题，这就很快达到了通车的目的。”其他人员一听我的话，都认为这样办很好。赵听了说：“我去跟顾问商量商量（当时他们有一个日人顾问在专车上未下来）。”过了半小时后，他返回会议室说：“顾问认为可以那么办，就那么办吧。”第二天，双方有关人员在我们总的领导下分别接头，不到两个钟头，关内外通车的技术问题办理好了。当时双方议定：

（1）关内外客、货车都可以联运法办理。客车票及货运费互相拨款，以山海关为界，北宁局把关外段的客货运费款拨给奉山路局；对方给北宁路局拨给至山海关段的运费款。

（2）双方客、货车乘务人员及机车均在山海关交接。

通车问题既已洽商好，我就回到山海关工务段，将赴沈洽商通车经过写信直接向天津的北宁路局汇报。然后，又随该委员会专车回沈阳。这时大约是在 1932 年 1 月的时候。双方接头后不过两三天的时间，关内外就通车了。

当我们回到沈阳时，赵曾问我：“你是否愿在这里当工程科长？”我回答：“不！我要干的话还是回沟帮子当段长。”他没说什么。

通车后约一个月的时间，所有退到关内的员工，按双方商议意见，也都返回关外上工。通车后不久，我就请假回家省亲（因我原在沟帮子段工作，所以也算关外人员），经奉山路局批准，给了四个礼拜的假期。回家过天津时，让我建天津车站（现在的东站）的风雨棚，完工后，又派我任唐山段管段工程师（时在 1932 年夏）。我到唐山后不久，日寇又侵入关内，一直打到唐山。我又随军退回天津候令。随着卖国的《塘沽协定》签订，日军退出关外，但冀东一带已处于日寇的卵翼之下。我又回唐山工务段，这时候关内外两个路局双方都给指示，麻烦当然很多。我当然是不听从关外路局的指挥的，因而遭到他们的忌视，致我无法在唐山段工作。于是请示调处工作，经津方北宁路局批准，调路局工程科任工程师，我才算又脱离开敌伪势力了。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王以哲将军

王 凤 起*

一、得张知遇，如跃龙门

王以哲将军，字鼎芳，黑龙江省宾县人。日制中学四年毕业，后去北京投考清华、北大，没有考取。无颜回家，乃投笔从戎当了大兵。由于他能吃苦耐劳，很快被提升为准尉司务长、少尉排长。值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招生，考进该校步兵科学习。

王以哲从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后，满怀爱国爱家乡的心情来到沈阳，企图投效东北军。连日奔走，毫无头绪，眼看床头金尽，遂冒昧地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短信，给当时的少帅张学良将军。信中内容大致是这样：目击日寇纵横，国势危殆，凡有爱国心的青年，莫不发指。个人身为军人且系东北人，不忍坐视，故于保定军校八期步科毕业后，迳来沈阳投效东北军。孰料连日奔走，无人受理，似乎偌大的东北军，已经人才济济，连一个小小尉官都容纳不下了。然而我看到的是，东北军军纪不整，扰民特甚，为官者不知兵，只知吃喝嫖赌，为兵者以老百姓为刍狗。个人固不敢自誉为贤者，但在正规军事学校毕业，学有专长。还抱着一颗杀敌报国、整军爱民的决心，回到家乡，自谓当一名下级军官尚可充数其间。不料今竟穷途潦倒于旅邸之中，食住皆成问题，望钧座易力而处之，能用则用，否则，即请速赐回音，以绝留连之念，俾别作打算。

书上之后，他觉得没有多大希望，因为信中的语言，实际上就是骂大街，意思是骂一骂出出气，然后一走了之。以故把信发出后，就开始计划回宾县老家看看，再回关内投效直皖军。

当天晚间正忙于整理行装之际，茶房领着一位身着上尉军阶的青年军官，奉张学良将军之命特地来请王以哲去见少帅。王听闻之下，心情十分激动。张学良将军一见之下，深予器重，当派他为东北教导总队第一期的中尉排长，因为王在入军校前曾当过少尉排长。

为了报答张学良将军对他的知遇，克尽厥职，大显身手。他所领导的一个排，六个月毕业后，迥然不同于其他各排。在他的带动下，该连的学术科考试成绩为全教导总队各队之冠。

教导总队第二期开学，王被提升为上尉连长。他的干劲也因之更大，与他比肩的人，十分嫉视他，诬告他标新立异，虐待学生，是踏着学生肩膀向上爬的人。当他声誉日隆之时，正是诬告他的信件最多之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查明真相，亲自到教导总队视

* 作者当时是东北军学生队、王曲军训团学员，东北军下级军官。

察，举行操场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刺枪等测验。恰好王以哲连的学生各科考试测验的成绩又为全教导队之冠：其中以实弹射击的成绩尤为突出。他的一连的学生没有不及格者，最难能可贵的是，过半数学生皆得满分。

在这次检阅讲评大会上，张学良将军非常高兴，他觉得个人有知人之明，当着全总队的学生和军官的面，反把告王以哲的信件当场焚毁，把诬告人予以严厉谴责。鼓励王以哲继续努力，不要有所顾虑。他说：“你的成绩就是你在工作上的一面镜子，诬告你的信件就是对你的表扬书。”

教导总队第三期开学，王以哲升为少校营长。值郭松龄反奉，张作霖以教导总队为基干编成一个师，总队长王瑞华为师长，把教导总队的三个营编成三个团，王以哲由少校营长一跃而升为上校团长。

打败郭松龄，张作霖转危为安，张学良率第三、第四方面军再次入关。东北军由来已久的劣习是军纪太坏，为了整顿军纪，张学良将军决定给予穆春骑兵以缴械撤销番号处分。他亲自和卫队旅长姜化南少将到张家口车站处理此事。由于准备工作欠周密，在缴械过程中发生武斗，姜化南当场被打死。张学良幸免于难返回北京后，擢王以哲为其卫队旅少将旅长。

这个时期东北军发展很快，里面良莠不齐，由于土匪改编过来的部队，一直是野性难驯。接着第十九师又行整编，张学良将军为了使这个部队迅速好起来，乃提升王以哲为第十九师中将师长。到此，王以哲将军由中尉排长升为中将师长仅仅四年，连升六级。可谓风云际会，一帆风顺。但亦由于本人能干、肯干，方能致此。

二、恩威并用，治军有方

王以哲将军不仅对当代军事学术学有专长，对古代兵法也很透明。他一方面推崇汉李广、唐郭子仪以恩义得士卒心，一方面也赞扬与李广齐名的程不识，与郭子仪齐名的李光弼治军以严的作风。他在教导总队充排、连长时，每饭前和就寝前的一点空余时间必作刺枪、瞄准射击等各种基本动作。在他的身体力行带动下，学兵们也以此为乐，而不以为苦。他经常告诫说：“作为一个军人，放枪打不着敌人，白刃战时，刺不倒敌人，那还算一个什么军人？”他虽被控告为“王扒皮”和虐待学兵，但经他教育出来的学兵，一致称赞他是最贤明和最能干的青年军官，经常以他为榜样进行学习。

王以哲特别重视教育，当第十九师师长时，向张学良将军建议创办学生队，招收初中毕业生进行五年初级军事训练和高中文化课的培养，毕业后达到初级军官所具备的军事知识。这些学生很多成为他的基本干部。王以哲将军任第一旅旅长兼任东北学生队教育长时，时常听他训话，讲解军风纪与战争胜负有很大关系。曾一再提到岳飞之所以能百战百胜，成为南宋中兴的名将，主要原因是岳家军的军纪严明，深得人民大众的欢心和拥护。再加上岳飞的勇敢善战和率先躬行，故能以少胜多，百战百胜，金人常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他的旅司令部办公室中悬挂很大一幅刺绣字画，系南宋中兴名将岳飞写的诸葛亮前出师表。王以哲召学生队同学到第一旅参观，同学们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大家不约而

同地都围拢上那幅大字画。王以哲笑着说：“大家对这幅字画很感兴趣，大概因为它是岳飞写的诸葛亮的出师表。你们都看过三国演义，当知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其原因安在？诸葛亮一生的最大长处又是什么？”

王以哲猝然发问，同学们思想没有准备，一时谁也答不出来。他接下去说：“依我看诸葛亮一生事业的根基，完全得力于他的淡泊宁静的修养功夫。世界上唯有极冷的人，才能做出极热的事业来。诸葛亮隆中事卧，笑傲风月，该有多么冷。一旦被刘备请了出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急难之间，乃东连孙权，北拒曹操，西取巴蜀，南服孟获，六出祁山，席不暇暖，该是多么热？前后出师表鬼神壮烈，真的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到哪里做到哪里，其一生行事，光明磊落。读历史学古人，应该从中吸取适合我们作军人的地方。在行空城计时不慌不乱、镇定自若，这决不是个简单的事，何以有此？淡泊宁静而已。”

正因为王以哲推崇岳飞、诸葛亮等历史人物，虽在戎马倥偬中也手不释卷。当时人们都呼他为“儒将”。他曾著过步兵操典解释，文长 20 余万言，当时东北军的初等军事教育机构中，被当作很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王以哲贵为中将旅长，深得张学良将军的信任和倚重，身兼数职，而生活却极简单朴素，毫无官气。他好学不厌，诲人不倦，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和学生队的学生混在一起，暑假每晨必到校把自愿留在学校休暑假的学生叫起来共作晨操。他的操场动作熟练已极，口令恰到好处，动作起来特别整齐，学生也感到轻松愉快。他的指挥水平确比一般军官高出一等。由此可以看出王以哲将军在教导队所取得的成绩绝非偶然。这与他刻苦钻研、学有专长是分不开的。盛名之下，必无虚士，信不谬也。

1931 年暑假期间，他稍有暇即到学生队给学生讲述军事技术上一些较为复杂的知识。他还亲自领导同学们进行路上测图和简易测绘。初期，有些同学不高兴地说：“我们是在休暑假，不是上短期训练班，教育长为何不顾疲劳折腾我们？”以后大家看到真的学会一些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并且也觉得和教育长在一起就产生活力，他的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兴趣横生，再累也不觉得累。原先不高兴学习的同学也积极起来，只要听到教育长来校，同学们不约而同跑去他的休息室问长道短和他闲聊。他总是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因此常常地把午餐误了一二小时。同学们只要提起教育长由衷地感到敬佩和恭顺，一致呼他为鼎公老师。

暑假结束的前五六天，教育长王以哲郑重其事地请同学们到沈阳北大营第一旅，参观野外演习和士兵们的业余生产情况。同学们对这次参观热情很高，早 4 时起床，早餐后 5 时左右到达北大营旅司令部。王以哲早已等候在那里，他笑着说：“这个暑假，你们确实辛苦了。这次来大营以娱乐为主，参观为辅，我已令副官们给你们准备许多好吃的东西，不必拘束，尽情地吃喝玩乐吧。现在先去参观野外连的对抗演习，然后吃午饭,休息一小时,再去参观工厂。”

第一旅的工厂办得很好，获利甚多，都用来改善士兵的物质生活，接济比较贫困的士兵家属。设有招待所，专为招待来部队探望士兵的家属。这些措施是当时别的部队所没有的。

王以哲每次校阅部队或举行各种竞赛，结束以后，总是有升迁调补的变动。在他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麾下没有一点长处，企图以奉迎吹拍、向上爬的人，肯定是找不到市场的。从他惯用考试的方法来提拔干部，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用人唯贤者。

在他的麾下所有军官佐和学兵们都锐意钻研学术，到处都可看到一些手不释书人，背诵外语单词和古典文学作品；练习刺枪和瞄准射击等动作，假日里课堂也常是满满的。该校号令十分森严，处处有规章制度可依，人人有所遵循，一点忙乱现象也没有。今天回想起来，王以哲将军确系军事上的人才，公正廉明，爱惜士兵，爱护国家，既有学识，又有治军的才能。

三、拗于服从，卒成大错

1931 年 9 月 18 日事变之前，日本以所谓的中村事件，每日向沈阳军警宪挑衅，惹得市民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学生队同学上课都不安心了，大家一致要求教育长王以哲将军予以解释。请他阐明应以何种态度对待此种严重局势，大火业已烧到眉头，谁也再不能静下心去学习了。大家义愤填膺地要求和日本一拼。

九一八事变前三天，王以哲来到学校，当着全体学生和官佐们发表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应付的对策。在困难紧急关头，必须沉着冷静，服从命令，他严禁学生和士兵在这一期间离开营房或学校到大街上去，使日本人找不到寻衅的借口。他再三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决不能违背长官的命令，上级让他怎样行事，他就怎样做。他也谈到日本已经欺压中国到了极点，确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想法。从即日起每天午后完全改为操场教练。

九一八夜里，王以哲在荣臻（张学良的参谋长）的办公室里用电话指挥学生队的总队长汲绍纲上校把学生手中的武器全部收缴起来，存于库房之中以防闹事。当日军猛攻沈阳北大营之际，王以哲命令东北学生队的学生暂行放假回家，听候命令再行复课。

第一旅闯出重围，开往山城镇，王以哲化装逃出沈阳跟上自己的部队。由于他忠实地执行了不抵抗的政策，又把部队辗转带进关内，驻防在北京清河大楼。

当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声援东北义勇军，以实际行动支援马占山的江桥抗战时，部分逃来北京的东北学生队同学找到王以哲，请他讲讲当前国内外形势，他的神色显得抑郁和沮丧。一开始就无精打彩地说：“你们今后别再尊我为先生了。我最大的短处就是无知和没有远见，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情况，没有足够的研究，对历史知识也很少，因之认识总是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作为一个高级将领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马占山将军是个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却一下子成为举世歌颂的民族英雄，我从内心钦佩他的大无畏精神和富有正义感。回想我在沈阳有那样好的抗日条件，却成为不抵抗主义的跑龙套者，既可恨亦复可耻。看起来古人所谓：‘士光器识而后文艺’，真是至理名言。我读了许多书，却未能活用。往往拗于书成为书呆子，还不如那些没有读过书，单凭理去做的人，来得干脆。你们还问什么国内外形势，报章杂志上不是论得很透彻吗？无助自助者，我们自己受侵略而不先去流血抵抗，却把希望寄托于别国的干涉和声援上，岂非等于一个傻瓜角色。在那样大好的既设的国防工事没有抵抗，坐以待毙，拱手把大好山河送给日本人，作为一个军官，作为一个带兵的将领来说，该是多么愚蠢！我永远也忘不

了这个奇耻大辱。”从此以后，人们已经明白鼎公不是在沈阳时的教育长了，他的言论和想法完全变了。不仅如此，他曾一再向张学良将军建议，别再听蒋介石的那一套中央外交了。他认为，东北人的事应由东北人自己来决定。东北军应立即联合一切爱国人士和爱国的军事力量，单独和日本人周旋。到一定的时期，必然会引起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东北军都是有利的。

王以哲像赎罪似的，尽一切力量支援抗日的军队。派遣学生队的学生到义勇军里做工作；当第十五路军支援抗日，他的这种跃跃欲试的举措，自然抵触于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卖国政策。此时全国人民已一致起来要求蒋介石下令抗战，去南京请愿者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而握有一师（此时王以哲的第一旅改变番号为第一〇七师，而人数不变）兵力的王以哲将军，又恰恰与这些请愿者同样的主张，因此就把他调为北平军分会第一处（军衡处）的中将处长。

四、正气凛然，婉谢蒋诱

1933 年热河失陷后，全国舆论和人民对不抵抗主义攻击特别强烈，蒋介石为了寻找替罪羊，到保定召见张学良将军，让他承担不抵抗的罪责而引咎下野。

张学良临下野之前，为了使其军队团结巩固，把东北军编成五个军，每军辖四个师。王以哲将军是后起之秀，被编为第六十七军军长。一次，我去见王以哲将军告以大学里的种种情况，他喟然又曰：“这年头的书，也用不着读了，学什么也没有用场，国已不国，还呆在象牙塔里干啥？依我看，现在机关枪就是政治。一个混蛋透顶的军阀有几万大兵在手，就可以割地自雄，当起土皇帝来。你们知识分子看不起大兵，才不想当兵，所以也就掌握不着机关枪。因此，政权也就到不了知识分子的手里，而听任坏人的支配。我希望你再穿上军衣，学点杀敌救国的本领，可能比空谈救国更实际一些。”

热河沦陷，长城不守，日军进逼北京，眼看热河即将继东北而亡。国家确已到了风雨飘摇、任人蹂躏的时候了。真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此时只要听到鼎公在家，总想找他聊聊，请他指点迷津。一些同学要求到他的部队参加抗战。他劝说；“趁年富力强，可进中央军校学习三年，毕业后再回到东北军。”他还让同学们到日本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学习。说：“我只希望你们爱国爱家乡，别忘记抗日就行了。”我们很多学生队的同学因以王以哲的鼓励指导考进了中央军校第十期。

在军校学习期间，某次纪念周上，蒋介石谈及东北军的情况时，对王以哲将军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东北军高级将领中，有政治远见而能力最强者，当以王以哲将军为最。并且说对王这样的人才，应该和他常接近一些。弦外之音，要拆散东北军的团体，应该从王以哲入手。

没过多久，蒋介石电召王以哲到庐山开军事会议。一见面就把王以哲将军表扬一番，并赏给他五万元。暗示：只要王以哲将军能直接听他调遣参加“剿共”，要官有官，要钱有钱，把东北军组成某一路军，由王以哲将军担任总指挥，取代张学良的地位。王以哲将军直截了当地说：“我是张副司令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他临出国时一再叮嘱我，有关重大问题务必和他商量后再做决定。请委座直接和副座商量，只要他同意

把东北军调出来‘剿共’，我是绝对服从命令的。非然者，背信弃义，只图个人的禄位，我将不齿于侪辈，有人如此，委座又何取焉。”蒋介石满以为他惯用的法宝，一个官，一个钱，就可以收买一切，就可以制服一切。无奈偏偏遇到了讲道义、重诺言，正气凛然的王以哲将军，他的法宝也就黯然无光了。蒋介石愕然不知所对，于是心忌王以哲将军。

五、为了抗日，急谋联共

张学良将军从欧洲回国，为了重新掌握军队，就任“剿总”副总司令，对蒋介石的话十分服从。把急欲抗日的东北军全部南调，投入内战。

王以哲将军从东北军南调参加“剿共”时起，他觉悟到待“剿共”完了再行抗日，则抗日将永无实现之期。

他曾和我们东北学生队的同学谈过“剿共”的问题。他一再强调当前中国是军阀割据的局面，列强虎视眈眈，哪还容得我们再打内战？况且“剿共”军事，尽人皆知，绝不能短期结束，未等内战停止，而中国早被日本占领了。兄弟阋于墙必被外人欺辱，这是一点普通的常识。所以我认为只有联共抗日，才是求生之道。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东北人而喊抗日。很明显，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称霸世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的国土有限，而日本的私欲无穷，以有限的国土，填无穷的私欲，势必灭亡中国而后已。试问，国已不国，还“剿”什么共？

已经尝到了“剿共”的许多苦头的王以哲，认识到消灭红军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领略了蒋介石对东北军的黑心。如果长此下去，非但消灭不了红军，首先是把东北军自己消灭了。同时也清楚看到共产党所倡导的全民共起抗日口号，无一不暗合他个人的意图。

1936年1月，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从红军回来。高团长是1935年10月在甘泉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俘去的。在瓦窑堡高福源参加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还被选为学习班的班长。学习期间，周恩来副主席曾亲临该班做了一次报告，形象生动地分析了抗日道理，指出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重要。周副主席的亲切讲话，打动了高福源，给他很大启发和鼓舞。他决定返回后把所见所闻传给东北军，并准备向张学良将军做联共抗日的说服工作。

高福源回来时正是张学良从上海回到西安之后，切盼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的时候。高是王以哲的亲信团长，回来后把在被俘期间的感受，密陈之于王以哲将军。恰好王将军受张学良将军的委托，让他在前线寻找共产党的线索。王对高福源的归来很高兴，尤其对高福源带回红军给东北军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要求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王以哲更为高兴。王以哲即给张学良将军发了电报，张学良将军立即接见了高福源。高福源见到张学良，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和周副主席给他的信，陈述了共产党的爱国抗日的方针政策。张学良此时已经彻底认识到“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是十分错误的。因此，他很高兴高福源的归来。他派高福源仍回瓦窑堡，并由高带回一封信，约中央负责人相见于洛川。

1936 年 2 月底，王以哲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会见。3 月 5 日，红军与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订立了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开展红白通商的“口头协定”。

同年 4 月 9 日，张学良、王以哲两将军和周恩来同志在肤施（延安）清凉山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里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中共方面还有李克农、刘鼎两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坦率交换了意见，协调了部署。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互派常驻代表，并解决了通商等一系列问题。这样，红军与东北军由过去两军对峙的局面，变成了能够合作的友好关系。

王以哲将军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中共红军是真正抗日的主要力量。他曾经说：“若果全国各党派皆像中共以救国为先，我们便用不着对日寇恐惧了。我们中国也就可以得救了，我们东北人也就可以回老家了。”当时红军与东北军为抗日救国而进行的各种联系，有许多都是由他转达和沟通的。他是东北军中与我党、我军联系较早，关系密切的主要将军之一。

六、办军训团，统一思想

为了整训东北军，灌输进步抗日思想，张学良将军于 1936 年 6 月创办王曲军训团。团长是张学良自己，副团长是杨虎城将军，教育长是王以哲将军。共办四期，前两期的教育长是王以哲，总队长是缪澄流，后为沈克。后两期的教育长为黄显声①。

在王曲军训团第二期开学前一周，张学良将军命令王以哲将军对 60 名军校毕业生进行为期一周的思想教育，启发同学们爱国爱家乡，不忘记在日寇铁蹄蹂躏的东北同胞。

教育长王以哲对南宋末年的文天祥，不计成败抗元的民族气节推崇备至，并请专人讲解天文祥的正气歌。他虽未公开骂“安内攘外”的卖国政策，但每次讲话结尾时，总是论证中国的大患是日本的侵略。而所有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也总是得寸进尺，直至把弱者消灭而后止，因此退让装老实是行不通的。有一次我利用周日到西安城内粉巷 27 号王以哲将军家去请教。我提出来到西安后，心情十分沉重。简单说：我有一个隐忧、两个不解。一个隐忧是：东北军内部思想不统一，副座周围有些人的讲话和副座的意向不合拍，实在是东北军的不祥之兆。两个不解是：东北军真有决心要和中央军火拼，更应隐蔽其企图，不能使对方有所警觉和防备，可是我看到的和听到的，则是一些虚张声势的叫嚣，如果我们无意和中央军冲突，而令它误解我们要打它，这是自危之道，此我之不解者一也；王曲军训团训练的主题处处显示出和中央的国策“先安内而后攘外”相矛盾，而且是针锋相对的，难道蒋介石会听之任之吗？我说完这些话以后，鼎公说：“副座周围的红人确很骄傲，自命不凡，但他们官阶不大，地位不高，不致于像你所说的那样为害之烈吧？至于‘两个不解’，这是由于你初来乍到不太了解东北军内情的缘故。蒋介石了解东北军比东北军自己还清楚，他深知副座是忠于他

①据曾任西安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惠德安回忆，在王曲军训团教育长王以哲之后，张学良曾任命原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为王曲军训团教育长。

的。他曾对副座说过：‘你的部下和中共勾勾搭搭，你如管不了，可把部队交出来，由我来代你管管。’副座回来对蒋介石的话也曾产生过疑虑，深恐蒋介石夺走他的兵权。后来通过事实，蒋并未让他交出部队，才渐渐打消了疑虑。蒋深知东北军是一个思想杂乱的部队，说啥的都有，干啥的都行。可是他也深知张副司令在东北军里的威信是特别高的。因此，只要掌握住张学良将军，别的也就用不着深究了。按照目前东北军的言行，若不是蒋介石对副座有所了解，他是不会容忍的，然而这样的局面必不能维持长久。我这个一向忠实于副座的人，今后处境将越来越困难了。”王以哲将军说完这些话，精神显得疲倦，我当即告辞。

对于抗日问题和东北军的现实存在的问题，我写了一份万言书，在王曲军训团开学后一周的一个晚上，我当面把这份材料交给教育长王以哲将军，请他得暇看看，如果有利于国家民族，有利东北军，就请便中转呈给副座一阅。

教育长真的仔仔细细地把该万言书看了，并在材料上加上顶批和圈点。

军训团第二期毕业前数日，在一次晚会上，教育长令我们 60 名毕业生临时退席回宿舍练习唱歌。然后向在座的其他东北军军官说：“希望诸位同仁对军校的 60 名毕业生勿存派性，应当好好地提携使用，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热爱家乡才报名来到东北军，勿令他们的热情受到挫伤，希望变成失望而去。别以他们都是二十多岁孩子而轻视，须知古往今来的英雄人物多出自少年。有智不在年高，无智空活百岁。”

正因为王以哲的声誉越来越高，诽谤诬蔑他的流言蜚语也越来越甚。说王以哲将军是保守派的头，在军训团里好讲《大学》之道。我们 60 名毕业生都参与军训团第二期受训，没有听过王以哲将军本人讲过《大学》，只是听过别人讲过《大学》，主持人是陈旭东上校。还请王晶周上校讲文天祥的正气歌。在军训团整个训练的全部科目中这些古典东西所占分量是很少的，即令讲讲也不过是用来敷衍一下特务而已。因为蒋介石在庐山军训团专讲《大学》、《中庸》之道，王曲军训团创办时也是借用整军“剿共”的名义，怎么可以一下子全讲新的进步内容？军训团训练的项目有政治、经济、国际形势、军中利弊、游击战术等。另外，主要讲的是鼓舞学员提高抗日情绪，大唱抗日救亡歌曲，如电影《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以及《大路歌》等。由于王以哲将军唱歌的热情很高，常常占用学员休息时间，我们 60 名同学中有一名叫孟祥武的同学，当众向教育长提出意见：“唱歌的时间过长，不合乎卫生，且常常占用学员休息时间，既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更有损学员的健康。”教育长听完孟祥武的发言后，很不高兴地说：“小小的年纪，这么一点苦又算什么？唱唱歌就嫌恶这个‘长’，那个‘短’？”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在我们同学看来，王曲军训团无异是抗日训练班。同学们私下议论说：“东北军真要单独去抗日吗？”从这些事实都可以说明王以哲将军是坚决执行张学良将军的指示和意图的。

七、战和之争，大树为摧

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前已经形成所谓的少壮派与稳健派。西安事变后，少壮派认为蒋介石不敢真的打内战，只要东北军摆个要作战架式，中央军就会软下去。他们还认为为

了营救张学良将军回来就是冒险打一仗也是应该的。稳健派认为张学良将军被扣在南京，东北军主动权完全丧失，只能接受中央的条件和平解决。王以哲表示同意稳健派的意见。

西安事变前，有人已经诬蔑过王以哲企图取张学良而代之。张被蒋扣押在南京以后，东北军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很激烈。而王以哲又主张和平解决，再加上蒋介石派遣的职业特务推波助澜，大肆造谣说：王接受蒋的贿款，足有一飞机的钞票。使矛盾愈形复杂尖锐。

1937 年 2 月 1 日晚上，主战派少数领导人贴出“除奸”标语，秘密策划了杀害王以哲将军的行动。2 月 2 日早晨，孙铭九、应德田等为了争取别人的同意和支持，用车把住在西安比较有实力的军官接到金家巷，如炮七团团长刘佩苇早晨尚未吃早饭，即被来车接到金家巷。

王以哲将军卧病在床，不能动转。室内仅有军医一名和他的夫人。当凶手于文俊闯进病房，不容分说，举枪要打时，王将军立即把被蒙在脸上说：“我是忠于张副司令的，你们竟敢这样胡作非为，东北军的前途，张副司令的命运和你们自己的未来，一切全完。”凶手竟毫无顾忌地开了枪，射出罪恶的十粒子弹，击中七弹，一代儒将，忠于张学良、忠于东北军，作为东北军团结的核心人物的王以哲将军，竟毫无代价地惨死于这群宵小之手，享年仅 41 岁。

周恩来副主席亲率中共代表团成员给王以哲将军至唁。 2 月 4 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领导致电王以哲的家属。电文云：“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

事后不久，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

（1984 年 6 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